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



qianqian
wanwan
zhongguoren

千千万万中国人

千千万万中国人

——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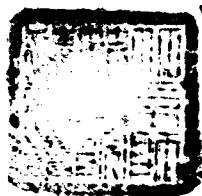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7680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王鹿鹿 马红星 张奇志 译
张卫族 谢亮生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57680

责任编辑 马晓光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李玲玲

千千万万中国人
QIANQIANWANWAN ZHONGGUO REN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15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171 定价: 1.45元

内 容 提 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破裂时期来到武汉，目睹了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的革命运动发展和暂时失败的大量事实。本书对此作了真实而详细的记述。在大革命的低潮中，她断言，人民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她的预言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本书最前面一章“广州序曲”，则记述了她一九二五年在广州的所见所闻。

斯特朗女士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我们出版此书，以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本书根据新世界出版社（北京）

一九六五年英文第一版译出。

译者前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〇），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年轻时她就投身进步的社会活动。二十年代初赴苏联，一九二五年冬返美，途中访问了中国。一九二七年第二次访问中国，写了《千千万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s）（一九二八）一书。一九三〇年她在苏联创办了英文《莫斯科新闻》（Moscow Daily News），担任主编和特稿撰写人。一九三六年回美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她两次来华，曾到延安访问。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访问了解放区，写成了《中国出现黎明》（Dawn Out of China）（一九四九）和《中国人征服了中国》（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一九四九）两书。1958年她来华定居，一九七〇年在北京逝世。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New World Press）出版了作者补充、改写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地区的革命》一书（列为《斯特朗中国革命文选》第一卷，此文选原拟出六卷，第二——六卷尚未出版），向国内外发

行。书中记述了斯特朗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目睹和经历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事件，对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革命运动以及国共合作破裂的情景，记述尤为详尽。对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十分真实而珍贵的史料。

斯特朗此书虽在国内外一再印行，但是一直无人把它从英文译为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现特据作者订正的英文本译出，供党史、革命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参考，也作为对这位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的纪念。书中原有作者在一九六五年为《斯特朗中国革命文选》写的一篇序言，这次翻译时略去。译者所作注释标以“——译者”以区别于作者原注。中文人、地名未查到原名者采音译，并予注明。姓不再另注。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翻译：张奇志同志译《广州序曲》、第三章，王鹿鹿同志译第一、二、四——六章，马红星同志译第七——十三章。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张卫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编辑室谢亮生同志通校了全书。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杨云若、马晓光等同志的指正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一九八五年一月

DD64/01

目 录

广州序曲 (一九二五年秋)	(1)
第一章 逗留上海	(14)
第二章 溯江而上	(25)
第三章 汉口的革命力量	(36)
第四章 进入交战区	(53)
第五章 将军聚会郑州	(66)
第六章 工人聚会汉口	(84)
第七章 中国的劳工领袖	(99)
第八章 为女权斗争的战士	(116)
第九章 中国的新女性问题	(131)
第十章 湖北的学生与农民	(152)
第十一章 反动派统治下的“赤色”湖南	(168)
第十二章 永丰的革命	(186)
第十三章 革命的片断	(201)

广州序曲

(一九二五年秋)

一九二五年秋，我从莫斯科回温哥华，中途访问了中国。我已经成了专写革命变革的作家，住在莫斯科，又常常回美国讲演，沿途也在我感兴趣的其他国家停留。几年来，革命力量激荡着中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推翻了北京内阁^①；一九二五年的上海斗争，这次斗争中英国巡捕击杀了中国工人；还有同年的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我要去看看。

当我在火车上看着西伯利亚大平原延伸到大森林，并乘车从兴安岭南下到哈尔滨、沈阳、北京时，我感到在苏俄的四年（在那儿，我曾做过一九二一年伏尔加河流域饥荒的救济工作，后来，我又协助办了一个孤儿收容所），已使我能象美国人难于做到

^① 指1919年6月13日北京政府钱能训内阁的瓦解。后由龚心湛代理内阁总理，政权仍为安福系所把持。——译者

的那样观察亚洲大陆。在那里我注意的，不是使大多数西方人惊叹“神秘东方”的异国的庙堂文化、古老的宫殿、奇异的风俗、法律和宗教，我看到的是许多民族的众多的农业人口——俄罗斯人、布里亚特人、朝鲜人、中国人——和任何美国农夫比起来，他们之间都更加相似。

当原始的办法抗御不了干旱时，大片农区便闹饥荒，可是人们仍为几百年来未曾变化的农地与家庭的老框子所束缚。农业劳动力从这些农区移居新建的工厂，在那里他们住在没有家庭生活的工棚里。所有这些现象都来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正在地球最古老的一块大陆上日渐崩溃，因为西方的铁路、工厂和工业文明正不可阻挡地渗入亚洲。它们以两种方式渗透进来：一种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南方赤裸裸的剥削，另一种是在北方的苏俄革命。二者之间必然产生战争。

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在各省暂握大权的是一些军阀。北京并非实际的首都，它只是为外国列强的外交方便而设。北京也是相继而起的军阀加于自己头上的一顶胜利的荣冠。如果伦敦或东京当局想占中国的一块土地，他们就贿赂某个北京的高级官员，以换取他的签字。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他们就扶植一个新军阀，长期占据北京，直到能够签订一项条约，从而向世界各国表明强占中

国土地的“合法”性。

至于中国人怎么想，无人过问。中国有句谚语：“皇令不出都门。”

当时，北京由张作霖、冯玉祥和吴佩孚三大军阀所包围并轮流统治，日本傀儡张作霖住在沈阳，过着当时所谓的“东方”豪华生活，即姬妾成群，珠宝、丝绸满仓；他在饰有标本老虎和价值几十万元珠玉的觐见室里接见来访者。我没有去求见。

美国人对控制着西北贫瘠地区的冯玉祥颇感兴趣。美国传教士称他为“基督将军”，赞赏他禁鸦片的法令和他的部队的风纪。因此，我在大雪纷飞时，乘坐一列没有暖气的火车，冻得要死地向西北走了两天，到了在蒙古沙漠中的冯的军营。我碰到了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他无精打采但谦恭有礼地背诵他的纲领。“中国的第一需要是普及教育，直到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其次的需要是修建公路和铁路。”冯玉祥让他的士兵忙于修建公路和扩张地盘，给他们蒙古农田作为报酬。我还遇到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后来在北京当了卫生部长。我们见面时，她有时还提起四十年前我们在蒙古沙漠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冯玉祥发表的纲领赢得了西方自由派的赞赏，可是“老中国通”们则乐于谈论他“背叛”盟友的轶事，而盟友们也背叛他，从而得到平衡；另外，

“中国通”们还乐于谈论冯玉祥奉承敌人的话。他们称这为“典型的中国方式”。现在，北京政府正嘲笑他拍给张作霖的电报，电报提议把他的军队借给他的敌人，“如果您需要，他们供您调遣”。当我问他就目前的力量他能控制多少个省时，他巧妙地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很吃力。”他正掌握着三四个省。在三大军阀中冯是唯一一对后来历史有影响的人物，有关的一些情况本书将要谈到。

北京也有大学生，它是一座拥有几所大学的城市。在京的外国人被一九一九年的伟大“五四”运动所震惊。学生示威反对日本对华的要求，直到卖国政府倒台。在外国人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的虚弱，他们并未由此推出中国学生的力量是强大的。开始时他们给国内写些有关学生运动的报道，后来则转而干些更有兴味的事，如到城外的旧货店买点玉器和丝绸。

就我自己说，我爱上了北京。甚至早在一九二五年我就这样说过：“要是我在北京真能干点什么，我真想住下去。”许多年后，当人民解放军横扫华北，我在美国的朋友都等着解放军拿下南京并在那儿建都时，我却笑了：“南京只是上海商业交易的边缘区域，北京将成为首都。”我没有从毛泽东那儿听到什么内部消息，我只是了解北京而已。

在北京，我遇见了法尼亚·鲍罗廷娜。我在莫斯科就认识她，后来，她和她丈夫突然不见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法尼亚告诉我，米哈伊尔·鲍罗廷是华南兴起的新的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他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来的。她说：“你一定要到广州来找我们，广州是现代中国。”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因大罢工而中断了数月，广州的小船也不和英国轮船接触。

她说：“我将提请罢工委员会发给你一张通行证。”

一九二五年我离北京南下，在汉口访问了吴佩孚。不到两年之后，我再次访问该城时，它已变成“红色汉口”了。吴佩孚以中国巨商及任何想在华中获利的外国列强作靠山，而多数外国列强都有此愿望。有些人说吴佩孚“诚实”，因为小军阀相信他会和他们分享帝国主义国家的贿赂。吴的“盟军”比别的军阀多，但却更不稳定。他们常在名寺聚会“谈经论典”，其实是在瓜分新占的地盘。我们谈话时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说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他还在扇子上写了一首小诗送给我。

我顺江而下到了上海。这个城市半属英国、半属法国。英法两租界之外才是“华界”。印度来的高个子锡克族巡捕公开在街上殴打干瘪的人力车

夫。在北京要用外交手腕加以掩饰的躲躲闪闪的帝国主义本性，在上海却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大家都说：“你不能去广州，那儿搞封锁，还有内战。”香港学生要想回广州的大学，得绕道上海走八天，而不是正常情况的四个小时的火车路程。

虽然孙中山先生几个月前逝世了，可他的遗孀告诉我她将帮我去广州。她是个文静、温和但果断的女性。在以后的年月中，我对这位使用自己姓名的宋庆龄女士有了更多的了解。她说：“如果你从上海坐船到广州而不去香港，我们就好办多了。但你是记者，两个城市都应看看。我给广州的哥哥写信，请他帮助你。”

我先去了香港。广州罢工，罢工工人坚持了六个月的封锁，在一百英里海岸上设立了纠察线。在这样的冲击下，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银行向伦敦求救以免破产，这个城市每天要损失一百多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后内华达州的那些鬼镇吗？我整个夏天都在想，这种现象会不会在大英帝国的第三大港，即在东方第一大港出现。”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

但罢工工人破例让我看到了他们的革命情况。我乘英国轮船从香港去沙面——广州城外的一个小岛。它现在仍是英租界。傍晚，轮船在我们要去的

沙面岛外抛了锚。这时，从广州海岸数以千计的小舢板中向我们驶来了一只汽艇，艇上飘扬着一面带有蓝角的红旗，蓝角中有圆形白色太阳的图案。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国民党旗，它将插遍全中国。我看见法尼亚·鲍罗廷娜坐在船尾，便赶紧提起我的小箱子走到下甲板，跳上小艇，在水手惊讶的目光下离开。这是几个月来，广州小船第一次接待英国轮船。

我象刚离开古老的亚洲，忽然闯进了现代世界。在整个华北，我被军阀和奇怪的礼仪搞得困惑不堪，我也开始说：“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是我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然而，这次广州罢工却猛烈、无情而坚决。它是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这儿不是外乡异域，而是故乡。

当汽艇离开大船和我听了法尼亚·鲍罗廷娜的头几句话时，就产生了这种身处故乡的感觉。“恐怕你得带个人，翻译或朋友。罢工委员会只准你带一个人。”接着，她给我介绍了一个与她同来的苗条的中国姑娘。“这是辛西娅·廖^①，你一定听说过她的父亲廖仲恺，那个刚被暗杀的工人领袖。我们就要去廖夫人家，妇联执行委员会正在那儿开会。”

① 辛西娅·廖即廖梦醒。——译者

辛西娅·廖是个二十一岁的充满激情的姑娘，头发乌黑光滑，有一双聪慧的眼睛。她把手轻轻地放在我肩膀上说：“我父亲站在广州百姓的最前列，他刚制定好一个稳定全省财政金融的计划。他们之所以杀我父亲，是因为罢工和革命就要成功了。但是父亲的思想将永远活在工人们的心中。为纪念他，我正在广东岭南大学攻读养蚕学，因为他说过我省农民很需要这一技术。”

我突然想起我在哪儿听说过“廖仲恺”这个名字。一家香港报纸曾说：“臭名昭著的工人领袖……送他子女到广州岭南大学学习……”这家报纸呼吁，正经学校不应收这种人的孩子，“以免毒害其他学生”。我身旁这位身着淡蓝粗布衣、连孝都没戴的小巧的廖小姐，正是他们说的“毒害”人的姑娘。

我们在码头乘上廖夫人那辆栗色汽车，穿行在广州街道上。辛西娅让我注意孙中山先生生前加宽的几条大街，这些大街使广州成了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她指给我看一条未竣工的坎坷土路，这是罢工工人献给广州的礼物，以报答广州将自己与黄埔联接起来的友好举动。黄埔是广州的港口和军事基地，位于下游十一英里处。

她说：“罢工工人正在加强这座城市，好让我们永远牢记这次罢工。”

廖家房上飘动着一条横幅，上面的中国字辛西娅译为：“精神不死”。她说：“我们把它当作我家的箴言。好多人写信给我们说廖仲恺‘不朽的精神指引我们前进’，所以，我们把这横幅悬挂在大门的上方。”

廖家房里，妇女委员会正在开会，讨论次日群众大会的有关事宜。廖夫人脸上没有敷粉，仁慈、悲伤的面容显出刚丧夫后的紧张和疲劳。她微笑着迎接我，然后转身去忙茶会的琐事去了。人们一边吃着美味的、精制的菜肴，一边讨论着许多事务。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目光诚实、锐利，她曾用七个月在莫斯科“学习革命”，此时，她正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一个四十多岁的知识妇女讨论即将召开的群众大会。别的人在谈论黄埔军校学生最近攻下惠州城的胜利，并说现在该是妇女组织红十字会的时候了。

她们还认为“海盗袭击”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到广州的前一周，有三艘汽轮装扮成广州政府的船只开到珠江，在一所教会学院附近抛锚后发出火警，然后绑架了最先赶到的五十名学生。海盗们从他们藏身的三角洲上传出口信说：这次远征花了他们一万元，他们希望除了捞回本钱外，还得赚一笔。

妇女们一致认为“这是香港派人干的勾当”。她们提到一个香港歹徒的名字，海盗们就在他家聚

会。她们说，一切事情必定按其顺序发展，国民党改组和广州革命政府建立还不到两年。她们说：“我们已经打败了三支反革命军队，并巩固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现在我们该肃清这些海盗了。”随后，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将要开始。

前进的任何一步都是通过斗争赢得的。就连展宽广州的几条街道也遭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商店要被扒平或向后移。但是路面展宽后，阳光和新鲜空气进来了，商店变得明亮、清洁了，汽车还能直接在店门口装卸货物，营业额迅速上升，商人们都从中得了利，他们又要求联合庆祝展宽街道。到会的一位妇女说：“现在正式的说法是，街道是由商人和市政府联合展宽的。”她眼里流露出温和的、宽容的怨恨情绪。

次日，在罢工委员会，我了解到罢工的经过以及它与广州政府的关系。罢工始于香港，十万名华工要求：“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香港居民不论中籍、西籍应受同法律之待遇，务要立时取消对华人之驱逐出境条例、笞刑、私刑之法律及行为。华工占香港人口五分之四以上，香港定例局应准华工有选举代表参与之权，其定例局之选举法，应本普通选举之精神以人数作比例。”^①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罢工工人

^① 作者引文与原件有出入。这里按中文文件所引编入。见《工人之路》，1925年7月3日出版。——译者